

佐藤春夫与田汉的情感错位

——有关中日文人交往的个案考察

武继平

提要：日本近现代文人之中，像佐藤春夫这样从对中国古代经典文化的“文学关怀”发展到对同时代中国政治表示出特别关注、并创作出大量相关作品的文学家实属罕见。佐藤春夫除了对我国经典汉学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之外，跟我国五四新文学家郁达夫、田汉、郭沫若、徐志摩、周作人、甚至包括文坛巨擘鲁迅等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关系。过去国内的研究由于资料匮乏，其实大多只涉及到郁达夫，而其他皆有待史料的发掘或考证。本文旨在澄清和揭示佐藤春夫与我国现代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卓越的剧坛领袖和国歌歌词作者田汉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比较文学 田汉 佐藤春夫 异国文人交往

作者武继平，男，1957年生，比较社会文化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外语系教授。（上海200433）

一、引言

中日比较文学界过去并非没有过“佐藤春夫与中国文人”框架下的课题研究。然而，两国学界的研究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日本学界的研究大多从接受美学视角切入。无论是文本研究还是作家论或社团考察，无论是探讨直接影响还是考证间接传承或潜移默化，问题的焦点似乎都集中在中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怎样受到佐藤春夫影响这一点上。而我国论者则似乎比较热衷于“异国文人友好交往”一类“非日常性”话题，故对隐身其后的深层异文化碰撞等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有所忽略。

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过去有两项成果值得关注。其一是1977年东京大学伊藤虎丸、丸山升及和光大学等著名学者联合主持的文部省跨学科重点项目“佐藤春夫与中国”；其二是中日两国学者合编的《田汉在日本》^①。然而，前者过于聚焦于郁达夫一人，田汉的问题仅触及皮毛；后者毕竟只是一部原始史料集。基于史实的作家及作品的论考，并藉田汉的个案观照日本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尚有待深入研究。

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仅依据第一手史料进行三个层面的梳理和论考。第一、田汉与佐藤春夫交往以及该过程中田汉的姿态。第二、佐藤笔下田汉的人物形象。第三、佐藤等日本文士与田汉的情感错位。

^① 小谷一郎、刘平编：《田汉在日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二、田汉与佐藤春夫的文人交往

田汉于1916年8月赴东瀛留学,1920年4月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科,1922年9月辍学归国。佐藤春夫结交中国新文学家从田汉开始,并通过田汉在上海认识了郁达夫、郭沫若、徐志摩、欧阳予倩和王独清;但对田汉来说,留日期间结识的第一位日本文学家却不是佐藤。在认识佐藤之前,田汉于1920年3月到京都拜访过著名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同年5月在东京“可思姆”(Cosmo)俱乐部认识了日本著名左翼剧作家秋田雨雀。

据田汉早期出版的日记《蔷薇之路》记载^①,田汉跟佐藤春夫第一次会面是在1921年10月16日。当时,“而立”之前业已功成名就的佐藤颇摆架子的问话惹怒了“穿着破旧的学生服”的田汉。他在日记中发泄道:“我并不是来拜门的,他不应该把我当做普通的支那学生和文学青年”。事实上,田汉早在1919年《少年中国》于上海创刊时就担任过该刊编辑,并在当时这个颇具影响的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使他在国内声名大震的《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1-1)、《秘密恋爱与公开恋爱》(1-2)、《说尼采的〈悲剧之发生〉》(1-3)、《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1-9)、《新罗曼主义及其他》(1-12)、《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3-4,5)等一批有影响的论文和《梵珉琳与蔷薇》、《灵光》两台新话剧。除此之外,1920年5月还跟郭沫若和宗白华共同出版过使国内青年为之震撼的书信《三叶集》。

以新时期启蒙文学家自负的田汉在跟日本文人交往时自然希望平等对话。正因为如此,他在与佐藤春夫交往的整个过程中未像郁达夫和陶晶孙那样恭谦并称之谓“师”,而是直呼“佐藤君”,自始至终显示出不卑不亢的文人傲骨。

一方面,我们从佐藤春夫留下的文字中看出,他在跟田汉交往的过程中显得相当冷淡。佐藤在纪实性身边小说《人间事》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写道:“(跟田汉)交往了一年。说是交往,其实只是对方登门拜访,我既没有回访过他一次,也没有将这个异邦人带到哪儿去玩过……田归国后依然不时寄来才气横溢的信,而我却一直懒得动笔。自知理亏,但始终没有回过信”。

1927年6月,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总政治部宣传处艺术顾问兼电影股长的田汉为了见习日本电影制作和物色电影摄影师这两项公务访日。逗留日本期

间,他在神户的文友、日本唯美派小说大师谷崎润一郎家中住了七宿(往程6月22日~25日;返程6月29日~7月1日),在东京的佐藤春夫家中住了三宿(6月26日~28日)。据《人间事》记载,仅6月28日一天,田汉就约见了30名日本文士。离开东京时,对新鲜小说题材求之若渴的佐藤春夫欣然接受了田汉的邀请,答应不久后去中国江南一带漫游。

田汉归国一周以后,携家眷来到上海的佐藤春夫受到了田汉和郁达夫等旧友的欢迎。在1926年7月10日至8月3日这段为时三周的时间里,佐藤春夫游访了上海、杭州、南京、镇江和扬州等地。除了南京和扬州两地以外,几乎都是由郁达夫亲自陪同。佐藤春夫事后在游记中多有微词,发泄了对田汉屡次爽约和怠慢友人的不满。

看来在1927年6月因公访日归国后不足半个月的时间里,田汉明显在故意疏远佐藤春夫。佐藤带着家眷抵达上海之时,田汉虽专程从居住地南京赶往迎接,但为客人接风洗尘后旋即返回了南京,把原来许下的亲自带领四处游览的诺言忘到了九霄云外。郁达夫见田汉把邀请来的客人撂下不管,于心不忍才亲自作陪。田汉和佐藤春夫自1927年7月开始彼此疏远并渐生隔阂。其中直接激化佐藤对田汉不满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来自郁达夫热情和田汉冷漠的两极反差。那么田汉对佐藤春夫的情感为何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生了突变了呢?

根据现有的史料可以看出,从慕名结识佐藤春夫到随后长达7年的文人交往,都是田汉单方面主动。对田汉来说,尽管最初对佐藤的傲慢有所不满,但整个留日时期的交往和1927年再度访日时的文人交流都应该说是愉快且颇有裨益的。如果说佐藤春夫疏远田汉的原因是由于田汉的失信造成的,那么田汉将旧友佐藤邀来中国却又故意冷淡待之的原因又何在呢?

三、对作品的考察

先看佐藤春夫创作的反映跟田汉交往的作品。

佐藤春夫根据1927年6月田汉访日和自己7月份的访华为题材,创作了《人间事》(1927)、《一旧友》(1927)、《西湖紫云洞的故事》(1928)等数篇纪实性身边小说和《忆游西子湖》(1935)、《秦淮画舫纳凉记》(1935)、《曾游南京》(1937)等游记。除去《西湖紫云洞的故事》和《忆游西子湖》两篇跟郁达夫有关以外,其他

① 田汉:《蔷薇之路》,泰东书局,1922年。

皆可看作与田汉交友的实录。

接下来再看田汉的作品。

田汉在东京高等师范学的是英文,加上精通日文,故翻译欧美文学时主要参照英文版而日本文学则直接译自原文。他不仅翻译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蜜欧与朱丽叶》,王尔德的《沙乐美》和梅特林克的《青鸟》,还有针对性地翻译或编译过一部分日本文学作品。笔者以田汉跟佐藤春夫交友关系开始疏远的1927年下半年为时间下限,对田汉所翻译、编译或改写的日本文学作品进行梳理,并将之归纳为甲乙两类。

甲类为日本著名剧作家们创作的话剧,包括菊池宽的《海之勇者》、《屋上的狂人》、《父归》、《温泉小景》,武者小路实笃的《桃花源》、《佛陀与孙悟空》,山本有三的《婴儿杀戮》,中村吉藏的《无籍者》,小山内薰的《男人》等作品。乙类为有关日本文艺的评论和翻译,包括编译综述性质的评论文章《日本诗人之中国音乐观》和《日本学者对“非宗教运动”的批评》。

如果再把时间下限稍稍往后推3年,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地发现,尽管田汉于20世纪20年代译过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但佐藤春夫的作品只有《〈殉情诗集〉自序》一篇。而且,在田汉一生中所创作的各种体裁的作品之中,找不到一篇以他跟佐藤春夫之交友关系为题材的作品。在他的创作中,略微涉及到佐藤春夫的,除了1921年10月16日写下的日记《蔷薇之路》和1927年8月发表在一家日本同人小杂志上不足300字的随笔《玉川清游记》之外^①,1928年2月刊载于报端的《从佐藤春夫的〈殉情诗集〉》^②和1930年刊登在《南国月刊》上的《我们的自己批判》^③。

笔者粗略计算了一下,这些多少涉及佐藤春夫的文字,全部加起来还不足3000字。根据这些文字,我们找不到田汉对日本唯美主义文学作家佐藤春夫从文学上表示认同的任何凭据。

四、田汉疏远佐藤春夫的原因

笔者认为,田汉疏远佐藤春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佐藤春夫在纪实性身边小说《人间事》和《一旧友》中详细描述了1927年6月田汉的突然来访。在他看来,支那留学生田汉回国后走上仕途,“并以南京政府电影股长的头衔踏上日本的土地,重返他的第

二故乡东京肯定有那么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④。此话出自在交往中一贯居高临下的佐藤春夫之笔下,对渴望平等对话的田汉来说就显得非常地刺目和令人不悦。田汉觉得自己不但无愧于佐藤这位老友,而且1926年以公职身份访日时也给了他面子。临赴日本之前,田汉分别给好友谷崎润一郎、村松梢风和日本普罗文学“文艺战线”派话剧团“前卫座”叶山嘉树为首的一批颇有交情的文人发去了电报。事实上,三方接到电报后都为田汉准备了下榻之处。然而,“前卫座”的人直到田汉抵达日本的前一天才从报纸上惊悉“革命战友”田汉这次是以北伐革命分裂后的南京政府官员身份访日。而且,田汉一到东京就被普罗文学的“文坛宿敌”佐藤春夫径直接到了私宅住下。田汉在东京逗留期间一直寄住在佐藤家中这一行为引起了“前卫座”诸君的愤怒。田汉在会上被当面指责敌友不分,应马上与佐藤划清界线。田汉试图解释但最终双方的隔阂还是没能冰释。

然而当事人的另一方佐藤春夫一个月后却在《人间事》中写道,田汉跟“文艺战线”派之间产生不和,都是因为田汉辜负了日本普罗文学“同志”的期待,竟然敌友不分,住在唯美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佐藤春夫这位文坛“宿敌”的家中的缘故。对佐藤春夫的妄加解释,田汉感到非常不悦。

第二,佐藤春夫在《曾游南京》和《人间事》中指名道姓地发泄对田汉的不满,指责田汉“为政府做事再怎样忙”,也不该“撒手不管自己邀请来的远道来客”。甚至不惜暴露友人的个人隐私,说当时田汉置客人于不顾的真正原因是第二次婚姻的失败,家庭纠纷搞得他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云云。

第三,佐藤春夫在《一旧友》中披露宁汉分裂之后左翼文人田汉不去武汉而投奔敌方南京政府的原因。指出田汉的这一行为之所以难以让人理解,是因为“涉嫌杀害他舅父(易梅臣)的真凶当时就在武汉政府,而且身居要职。田汉并非不赞同武汉政府的政治纲领。虽然南京政府不念北伐跟武汉对峙也不合田汉的本意,但一想到杀害自己父亲般的舅父和继而夺走他爱妻生命的家伙就在武汉,他难以自己拔剑投奔了讨伐武汉的军队。”^⑤在佐藤春夫笔下,田汉被描写成了一个纠缠个人恩怨而置信念不顾的庸人。

第四,佐藤春夫在《一旧友》中这样写道:“田汉跟

① 日本骚人社1927年发行《骚人》第2卷第8期。

② 《中央日报》副刊《摩登》,1928年2月9日。

③ 《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

④⑤ 《一旧友》,此处译自日本1927年第10号《中央公论》,第132、130页。

乡下的文学青年一样,没完没了地想结交所谓的名人。而他要见的名士人选并非根据他的个性尺度来选定的,而是仅根据哪些日本文学家在中国会受到重视这一标准所做的大致判断。由此看来,支那的日语读书界可谓与日本的乡下无甚差异”^①。这段话字里行间充斥着对田汉个人乃至整个中国知识群体的轻蔑。田汉素以天才自负,1920年在九州太宰府天满宫跟郭沫若自比席勒和歌德,其自尊又怎堪异邦文人这般奚落。

五、田汉作出的反应

1928年2月9日,田汉在《中央日报》副刊《摩登》上发表了《从佐藤春夫的〈殉情诗集〉》一文,并同时译出佐藤春夫《〈殉情诗集〉自序》。此文写于田汉1927年7月在“镇江某酒楼”与佐藤握别半年之后。田汉在文中介绍道:“佐藤春夫为日本现代名诗人,所为小说亦名重一时”。在指出佐藤“爱中国趣味”之特色,“归以中国故事为题材成佳章不少”的同时,笔锋陡转,揶揄佐藤“前之落拓抑郁如我者今则拥美妻抱爱女称‘小康作家’矣”。接下来话题触及佐藤的纪实性身边小说《一旧友》,指出:“斯篇指明写‘田汉’,而所写者不必是田汉”。说自己“之重游东京,纯为寻其心的废墟,并一访旧友”,既无“自喜谓为衣锦荣归第二故乡”之念,亦绝非“以私仇与友为敌”,严厉地批评佐藤春夫“误解汉之政治的立场”。

如果说1927年7月佐藤应田汉之邀携家眷来华时田汉表现出冷淡意味着二人关系开始疏远,那么半年后田汉的话显示出他们之间的情感错位已经激化。田汉在《从佐藤春夫的〈殉情诗集〉》中感叹道:“艺术家在能于一瞥之间捉住人性之真,与佐藤君交非一日,读此文(指《一旧友》)不能不叹知己之难也”,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佐藤春夫作为文学艺术家所具有的洞察力的怀疑。

两年后,田汉毫不忌讳地在被视为“左转”标志的《我们的自己批判》中称佐藤春夫为“那神经质的小说家”,显示出二人的关系已存在不可修复的裂痕。佐藤春夫写在《人间事》和《一旧友》里的那些有关田汉的细节和田汉本人所说的话,素材都应该来自田汉本人。创造社的事情、北伐革命、宁汉分裂、舅父易梅臣的被害、易漱渝的病故、爱妻临终前要求答应续娶其好友为妻等等,如此详细的素材佐藤春夫只有从田汉本人那

里才有可能获得。显然佐藤春夫往田汉本人提供的小说素材里添加了凭空想像的成分。

照理说这种立足于原始小说素材的虚构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精通日本私小说的田汉却不肯作出半点让步。因为他知道,佐藤春夫是日本私小说大家。私小说最基本的理念即只能平面描写事实,不允许虚构。这是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达成的默契或具有的共识,有别于其他任何小说。读者对私小说只写实情这一点深信不疑,故没有人会怀疑其中的情节是杜撰。正因为如此田汉才显得怒不可遏,并提出异议说:“那神经质的小说家佐藤春夫”“这一点完全听错了,因此我受他的连累不少”^②。

其实,田汉在1930年写下的《我们的自己批判》中已经把为何要到宁汉分裂后的南京去为国民党政府做事的理由陈述得非常清楚。虽不能完全排除自我辩解之嫌,但也不乏深刻反省之真诚。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或时合时离,或貌合神离。加之当时田汉在上海主办南国电影剧社,“四·一二”后有关北伐革命的宣传“利于武汉的比较少”。究竟是谁在“破坏北伐”,身在上海的田汉无法判断。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田汉行动的目的是“应该和衷共济地先完成打倒军阀底大业”。尽管不曾想过要“直捣所谓‘赤都武汉’”,“却愿意随‘校长’渡河杀敌,遂所谓‘直捣黄龙’之愿”。一言以蔽之,田汉当时离沪赴宁为南京政府做文化工作的直接动机是想继续北伐而并非其他。在田汉看来,动机是否属于“报私仇”而不惜“与敌为友”,乃重大原则问题,故才义正辞严地对佐藤春夫进行了驳斥。

六、田汉与“文艺战线”派的分歧

在本文的最后一节里,笔者想究明1927年田汉与日本普罗文学“文艺战线”派“前卫座”诸君之间产生隔阂的真相。此事与佐藤春夫亦不无关系。

仅据笔者所查,日本左翼文学“文艺战线”派在1927年6月田汉访日后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对这位中国左翼“战友”的严厉批评。然而,这种对田汉的不满究竟是否果真如佐藤春夫所言,仅仅是因为田汉辜负了日本“同志”的好意而“住进了唯美派作家代表人物佐藤春夫家里”的缘故呢?

其实,当时跟佐藤春夫关系密切的通俗作家村松梢风亦持同一看法。他在《骚人录》中写道:“田汉君来

① 《一旧友》,此处译自日本1927年第10号《中央公论》,第132页。

② 《我们的自己批判》,1930年《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

东京时尽管受到了前卫座诸君的迎接,但他却跟佐藤春夫走并住进了他家。前卫座诸君为此大为不满,在其后的会见中对田君的资产阶级思想“群起而攻之”,说什么:“我们都把你当同志,可你却不住进佐藤春夫那样的资产阶级作家的豪宅为耻,我们真是看错人了!”随后在场的每个人都跟田汉进行了一番唇枪舌剑的论战^①。

实际上,当时日本前卫座诸君对田汉群起而攻之虽然态度上未免有些过激,但并非不合情理。这批人中的活跃分子小牧近江和里村欣三在“四·一二”政变发生的1927年4月借参加泛太平洋反帝大会在上海召开之机,为加强跟中国革命文学家阵营的友谊和协作关系,为了“支持支那先辈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作为机关刊物《文艺战线》特派员来到上海^②。二人通过内山完造先找到郁达夫,然后再由郁达夫正式介绍认识了“著名革命文学家”田汉^③。他们回国后撰写题为《新军阀蒋介石之真实嘴脸》的檄文,表明了他们认为“不是张作霖,而是蒋介石把支那反帝革命拱手出卖给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立场,同时还刊登了田汉“全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家联合起来!”的亲笔题字^④。

日本“文艺战线”派前卫座诸君既然跟田汉之间有着“革命同志”般关系,自然难以认同田汉政治立场的180度转变。他们所表露出来的对田汉跟佐藤春夫关系过于亲密的不满实际上另有更深层的原因。围攻田汉是由于不理解、也不能接受田汉为蒋介石政府效力并以南京政府官员身份访日这一事实。所谓“群起而攻之”,也就是要田汉对此作出解释。

1927年6月28日,田汉在位于东京千駄谷的“前卫座”剧团一触即发的紧张空气中对自己的立场作出了几点申辩。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两条:

第一,佐藤春夫是旧友。自己并不了解佐藤跟无产阶级文学的敌对关系。抵达东京拒绝“文艺战线”派的安排住进佐藤家是因为没有细想就听信了友人村松梢风的一句话,“假令是现在,一定到前卫座看排演去了”^⑤。

第二,“日本大概念地观察中国了”。“所谓革命的武汉也不是那样可以赞美的。所谓‘南京政府’也不

是没有可做的事情。现在南京政府树立未久,他往那里去并不曾十分确定,为什么不可以加入他们的组织中去纠正他”。“革命的目的是一致的而方法可以两样”,“艺术家在任何政治势力下从事艺术的工作,他的自由于尊严总是可以保存到某种程度的”,再说“既然有人愿意用很诚恳的态度帮我们把它(新电影事业)完成,许我们以广大范围的自由从事制作”,未尝不可以进行一番尝试^⑥。

结果,田汉的申辩非但未能平息前卫座剧团诸君的怒火,就连他提出在日本为拍摄新电影《到民间去》想物色一位好摄影师的请求也遭到了断然拒绝。

就这样,田汉跟日本前卫座之间的芥蒂始终没有得到化解。当时跟田汉进行过激烈争辩的“文艺战线”派同人前田河广一郎事后在杂志《恶汉与风景》中写道:“此作家(田汉)在日本知己甚多,颇有艺术家之风度。但据本人看来,其思想格外反动。他现为国民政府的艺术顾问之一,这一事实即最好的证明”^⑦。这些话,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日本“文艺战线”派的一批人1927年7月以后对田汉的重新定位。

根据上述质疑与申辩,不难看出田汉当年应好友何公敢的邀请并跟欧阳予倩、唐槐秋夫妇等一起到南京政府总政治部工作并非心血来潮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尽管这种充满艺术家气质的选择建立在一种对文艺与政治之关系的理想化或曰充满稚气的理解之上。

七、结束语

通过本文从中日文人交往的角度对文学家田汉的考察,我们在获得了一个与考察对象同一时代大多数留日文人不尽相同的文人形像的同时,也理清了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一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田汉是一个明辨大是大非的硬骨汉。他一生追求真诚,不屑于圆滑。他的个性不仅体现在他含冤而死的晚年,也同样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早期与日本文人的交往之中。作为思想进步的中国作家,他跟一大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家有过较多的来往,但跟他从最

① 《骚人》第2卷第8期,1927年8月“异国情调号”。

② 山田清三郎:《*・f i l e 文学風土記*》,1954年12月青木书店。

③ 小牧近江、里村欣三:《青天白日の国へ》,《文艺战线》1927年6月号。

④ 此乃书写在正方形日本“色纸”上的毛笔题字,旁题“民国十六年首夏遇里村小牧二氏于沪上书此以作纪念”,署名田汉。国内似无存。

⑤ 田汉在《我们的自己批评》中回忆当时村松对他说过“若同他们会去有不少麻烦”的话。

⑥ 以上引自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田汉专集》第36页~第48页。

⑦ 前田河广一郎:《恶汉と風景》,日本改造社1929年2月。

密的却是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和村松梢风。可以说这三人跟他都没有共同的政治信仰。田汉对谷崎润一郎一生都不惜赞美之辞,跟佐藤春夫虽然有过七八年的交往,但最终还是由于思想上的距离和情感的错位而分道扬镳。村松梢风经佐藤春夫介绍在上海认识田汉。尽管他十分欣赏田汉这位“中国新文士”的气质和才华,并一再表示对中国要“尽量不触及当前的政治问题,主要按照自己及身边的生活氛围来观察”^①,但田汉

应邀为其主编的刊物《骚人》所写的文章却是一封暗示绝交的信^②。田汉在信中严正声明自己没有为《骚人》写稿是因为不愿意写。其理由是“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没有理由响应”村松“在济南事变问题上那样地支持田中政策”^③。

责任编辑:项义华

① 《〈新支那访问记〉序》,骚人社书局 1929 年 5 月。

② 田汉:《上海来信》,1928 年《骚人》第 3 卷第 10 期。

③ 1928 年 5 月北伐军进入山东时,日本田中内阁以保护居留山东的日本国民为借口,两度命令出兵干涉北伐,不但占领了济南,还枪杀了众多的中国老百姓,酿成“济南惨案”。